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下 册)

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

一九八三年五月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下 册

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

编 著 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冯光廉 朱德发 查国华

姚 健 韩之友 蒋心焕

一九八三年五月

说 明

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编写的同志（以章节出现先后为序）有：韩之友——第十章第一、二节，第十一章第一节，第十七章第三节，第二十章第一、二节；冯光廉——第十章第三节，第十九章第二、三节，结束语；姚健——第十一章第二、三节，第十八章；朱德发——第十二章第一节，第十四章第三节，第十六章，第十九章第一节；蒋心焕——第十二章第二节，第十四章第一、二节，第十七章第一、二节；查国华——第十三章，第十五章，第二十章第三节。最后，由冯光廉、朱德发两同志通稿。

1983年5月

目 录

第十章 叶绍钧 冰心 王统照	1
第一节 叶绍钧和他的《倪焕之》	1
第二节 冰心和她的小说	14
第三节 王统照和他的《山雨》	26
第十一章 郁达夫 蒋光慈 叶紫	37
第一节 郁达夫和他的《沉沦》	37
第二节 蒋光慈和他的《田野的风》	48
第三节 叶紫和他的《丰收》	59
第十二章 沈从文 张恨水	70
第一节 沈从文和他的《边城》	70
第二节 张恨水和他的《啼笑因缘》	81
第十三章 张天翼 沙汀 艾芜	91
第一节 张天翼和他的讽刺小说	91
第二节 沙汀和他的《还乡记》	100
第三节 艾芜和他的《南行记》	108
第十四章 丁玲 赵树理 周立波	117
第一节 丁玲和她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117
第二节 赵树理和他的小说	131
第三节 周立波和他的《暴风骤雨》	145
第十五章 朱自清 周作人	156
第一节 朱自清和他的散文	156
第二节 周作人和他的散文	164

第十六章 曹禺 夏衍 田汉	173
第一节 曹禺和他的《雷雨》	173
第二节 夏衍和他的《上海屋檐下》	192
第三节 田汉和他的《名优之死》	204
第十七章 《五奎桥》 《升官图》 《白毛女》	215
第一节 《五奎桥》	215
第二节 《升官图》	221
第三节 《白毛女》	227
第十八章 闻一多 徐志摩	234
第一节 闻一多和他的诗歌	234
第二节 徐志摩和他的诗歌	243
第十九章 艾青 臧克家 殷夫	254
第一节 艾青和他的诗歌	254
第二节 臧克家和他的诗歌	266
第三节 殷夫和他的红色鼓动诗	278
第二十章 《王贵与李香香》 《漳河水》	
《马凡陀的山歌》	285
第一节 《王贵与李香香》	285
第二节 《漳河水》	291
第三节 《马凡陀的山歌》	297
结束语	302

第十章 叶绍钧 冰心 王统照

第一节 叶绍钧和他的《倪焕之》

一、创作道路

叶绍钧，字圣陶，一八九四年生于苏州。他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这对他的生活、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九〇七年，他进入苏州公立中学读书，受到当时富有革命精神的南社诗人诗作的熏陶，接触到美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杂记》，渐渐培养起对文学的爱好和兴趣。一九一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曾使他一度感到兴奋、鼓舞，不久便陷入失望。恰在这年他中学毕业，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便做了小学教师。先在当地小学任教，一九一七年初应邀到苏州附近的角直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职。在这里他与热心教育的校长、同事通力合作，进行过一系列改良教育的实验。叶绍钧从事小学教育达十年之久，他对城镇教育界的情形有着细密的观察和体验。

叶绍钧开始创作较早。从一九一四年至他赴角直任教以前，曾写过十余篇文言小说，发表在《礼拜六》等鸳鸯蝴蝶派刊物上。这些小说“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①，如《穷愁》写丝厂失业工人阿松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贫女泪》写贫苦女子云姑嫁到富贵人家被折磨致死的悲剧；《终南捷径》则暴露了某前清旧吏采用卑鄙手段谋取高官厚禄的丑态。这些小说继承了近代“谴责小说”的传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社会下层人民的疾苦，暴露了辛亥革命后官场的腐败和封建势力复辟活动的现实。同时使作家从事新文学创作之前，在观察生活、处理素材以至艺术技巧上得到了初步锻炼。但是，这些作品明显地存在封建意识的影响和谴责小说常见的劝“善”惩“恶”的痕迹，有的作品还流露出鸳鸯蝴蝶派的趣味主义倾向，如写神怪故事的《孤宵幻遇记》，写无聊的爱情幻想的《玻璃窗内之画像》等。

叶绍钧真正从事新文学创作，是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蓬勃发展的一九一九年初开始的。那时他在五四新思潮的鼓动下，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五四前后，他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思考、探索社会人生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教育改革、妇女解放、职业问题的文章，表现了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女子人格问题》一文主张“女子自身，应知道自己是个‘人’，所以要把能力充分发展，做凡是‘人’当做的事”，鼓吹破坏“那荒谬的‘名分’‘伪道德’”，提倡女子个性解放。《小学教育的改造》一文，提出“知和行合一，修养和生活合一”的教育改革主张，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应该是“替儿童布置个适当的环境”，以“养成更健全的个人”。这些启蒙主张比较明确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主义、提倡科学和民主的精神，集中贯穿在他“五四”初期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中。从一九一九年二月在《新潮》上发表新诗《春雨》和白话小说《这也是一个人》起至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前，构成叶绍钧五四初期新文学创作阶段。这段时间，他既写新诗、散文，又写小说、童话，主要成就在白话小说。

五四初期叶绍钧写的小说主要收在《隔膜》（1919—1921年的作品）、《火灾》（1921—1923年的作品）、《线

下》（1923—1924年的作品）等三个短篇集里。这个时期作家创作的主要倾向是现实主义，但是开始几年一度呈现过现实与理想、写实与浪漫并存的现象。这在他的“问题小说”和“讴歌爱”与“美”的小说中表现最为突出。《隔膜》里的作品同时存在这两种倾向。作家的不少小说从探索社会人生问题出发，提出了一些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如《这也是一个人》（后来改题《一生》），提出了妇女解放问题；《你的见解错了》（后改题《两封回信》），提出了恋爱的指针问题；《苦菜》提出了劳动的苦与乐的问题；更多的小说提出了儿童教育问题等等。这些作品比较鲜明地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其中《这也是一个人》最有代表性。小说以纯粹白描的手法，如实地描写了女主人公——一位农村妇女的苦难遭遇。作家不加任何渲染，只在题目上暗示出作品的倾向：女主人公的不幸乃是对不把妇女当“人”看待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抗议，也是为农村妇女争取做“人”的权利的热切呼吁。这里的女主人公是现代小说出现较早的农村妇女形象，虽然略显单薄，却艺术地概括了广大劳动妇女的悲苦命运。由此可见，这类“问题小说”主要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比较鲜明地表现了现实主义倾向。与此同时，作家还创作了另外一些作品，侧重表现“母爱”与“童真”的主题。如《伊和他》描绘年轻的母亲与幼儿“爱”的交流；《母》表现主人公——一位女教师对儿女发自本性的爱怜；《萌芽》描写年轻的母亲怀孕后“母爱”萌生的过程，等等。这些作品同冰心、王统照的早期创作一样，带有较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它们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作家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探索。因为当时叶绍钧还不能用明确的阶级观点认识社会现实，只是把社会现实的阶级对立笼统地归结为

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而且这“隔膜”是少数人“有所为”而造成并维持的。他期望着总有一天大家会“赤裸裸地相见”，“到时，各人相见以心，不是相见以貌。我没有别的能力，单从小说里略微将此义与人以暗示”②。“母爱”与“童真”就是作家力图消除人间“隔膜”的药方。显然，这是过于天真的幻想，表现在小说里尤其显得虚浮。可喜的是作家不久就克服了这种倾向，更多地发挥了“问题小说”的长处，渐渐形成了自己现实主义特点：“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的地，写实的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③。暴露城镇教育界的黑暗，描写教育界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是叶绍钧五四初期现实主义小说的最出色的表现。作家说：“我做将近十年的小学教员，对于小学教育界的情形比较知道得清楚点。”④这类小说跟作家的生活基础是分不开的。写于一九二一年九月的《饭》，通过偏僻小村小学教师吴先生屈辱生活的描写，暴露了地方教育主持者的骄横、勒索，勾画出了主人公怯懦的性格。小说对吴先生这个卑琐的“小人物”的刻画十分逼真。《校长》的主人公叔雅虽然与吴先生的经济状况不同，但也是一个怯懦者。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写的《潘先生在难中》，是这个时期作家最优秀的短篇。它以江浙战争为背景，描写了教员潘先生在兵荒马乱中的生活和思想动态。小说真实地展现了军阀战争给这类市民知识分子造成的痛苦不安，同时又以出色的心理描写，勾画了主人公的小市民习性，诚如茅盾所说，它“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没有社会意识，卑谦的利己主义，Precaution（按：谨小慎微），琐屑，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等等心理，描写得很透彻。”⑤如果说吴先生、叔雅校长属于小市民知识分子中怯懦的一类，那么潘先生则是私心浸透灵魂而

又善于见风使舵的典型。一般来说，这些反映小市民灰色生活的作品，在暴露城镇生活（尤其是城镇教育界生活）的黑暗丑恶方面，是比较深刻的。它显示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但是作家选择题材的范围比较狭窄，又不大注意时代环境和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的描写（只有个别作品如《潘先生在难中》算是例外），这是很大的缺陷。

这个时期叶绍钧的创作除小说之外，还写过二十余首新诗，大部分收在与文学研究会其他成员合出的诗集《雪朝》（1922年6月）中。这些新诗多为托物言志的抒情小诗，如《春雨》、《扁豆》、《夜》等，大都情景交融，清新可爱，起了向旧文学示威的作用。作家写的散文数量不多，一部分收在与俞平伯合出的散文集《剑鞘》里。这些散文“风格谨严，思想每把握住现实”，往往成为青年学生学作“散文的模范”⑥。一九二三年作家出版了童话集《稻草人》，这是我国现代第一部童话集，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二五年轰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对叶绍钧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他在上海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他写了优秀散文《五月卅一日急雨中》，控诉了国内外反动派屠杀爱国群众的暴行，表达了对死难烈士的深切悼念。作家从坚持反帝宣传的青年和普通工人身上，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散文《认清敌人》、诗歌《五月三十日》、《太平之歌》等，也都真实地记录了作家对这一事件的感受。从此叶绍钧跟随时代稳步前进，并且给创作带来了新的变化。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是叶绍钧创作丰收的时期。这十余年间写的短篇小说收入《城中》（主要是1925、26年的作品）、《未厌集》（1926—1928年的作品）、《四三集》

（1932—1936年的作品）。著名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是我国现代文学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之一。它刚一发表就受到文艺界的广泛注意和高度评价。茅盾盛赞作家完成了一项“‘扛鼎’的工作”⑦；夏丏尊肯定“《倪焕之》不但在作者的文艺生活上是划一时代的东西，在国内的文坛上也可说是可以划一时代的东西。”⑧此外，还出版了第二部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等。这些作品表明，叶绍钧创作视野不断扩大，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的斗争，并且有意识地选取与时代斗争有关的重大题材，努力刻画斗争性较强的人物，现实主义的创作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这个时期叶绍钧的短篇小说仍有一部分继续反映教育界，描写知识分子生活。但是这些作品一般都增强了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批判更深刻有力，描写的人物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斗争性。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写的《城中》，描绘了回乡办学的青年丁雨生同社会上顽固守旧势力的斗争。小说在新旧事物的矛盾对立中比较突出地刻画了主人公坚毅顽强的性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写的《抗争》，反映了城镇小学教师的联合索薪斗争。小说通过主人公郭先生的形象，表现了知识分子的新觉醒和集体斗争意识的增长。一九三六年四月发表的《一篇宣言》，写的是国统区一批中学教师发表了一篇爱国宣言，执笔者因而获“罪”的怪现状。小说着力刻画了执教多年的老教师王咏沂的形象。他那正直沉静的性格和在持重的外表下隐藏的爱国心，被刻画得十分生动感人。王咏沂、郭先生、丁雨生的形象与以前那些怯懦卑琐的“小人物”相比，显示了作家创作可喜的进步。

除写知识分子生活以外，这个时期叶绍钧的短篇小说题

材不断加宽，与时代的联系更加紧密。“四一二”政变刚过，作家写了优秀短篇《夜》，最早反映了革命者横遭杀戮、社会一片恐怖的现实。小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上，着力描写了一位老妇人从惊恐到坚定，从思想烦乱到内心充实的转变过程，最后她决定勇敢地肩负起养育革命后代的责任。老妇人的形象表现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普通群众的新觉醒。一九二八年七月写的《某城纪事》，描绘了“四一二”政变前夕一批土豪劣绅、地痞恶棍投机革命，终于得势的情景。作家对老奸巨滑的劣绅陈莲轩的刻画相当生动、逼真。他的罪恶活动给国民党右派叛卖革命留下了一幅真实的历史剪影。一九三三年七月发表的《多收了三五斗》，反映了国统区农村“丰收成灾”的现实。小说通过一群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的牢骚、不满，暗示了农村的骚动和农民的动向。总之，这个时期叶绍钧的小说突破了以往题材的狭隘性，开始在比较广阔的社会环境中，表现现实的重大题材，揭示斗争的主题，加强了细节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形成作家现实主义的新特色。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叶绍钧很少从事小说创作，仅有的三、四篇短篇小说是在抗战的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写成的，收在《西川集》里。这段时间，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陆续发表了一些散文随笔，或纵谈教育问题，或评论文艺作品，或指导青年写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倪焕之》

《倪焕之》是叶绍钧应“教育杂志社”的邀请而写的。一九二八年一月开手写作，十一月十五日完成，以“教育小说”的名目连载于同年《教育杂志》上；一九二九年八月出

版。这是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以后长篇小说创作最早最重要的收获。小说描写小学教员倪焕之从辛亥革命过后到大革命失败十余年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迁。小说问世以前，长篇小说虽然出版过几部，但象《倪焕之》这样把主人公的命运与时代、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表现的，还没有过。小说发表不久，茅盾评论说：“《倪焕之》是他的第一个长篇，也是第一次描写了广阔的世间。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按：茅盾是从‘五四’算起的，故有此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城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在这两点上，《倪焕之》是值得赞美的。”^⑨这段话实事求是地说明了《倪焕之》在叶绍钧的小说创作和我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叶绍钧在《〈倪焕之〉作者自记》里说过：“每一个人物，我都用严正的态度如实地写，不敢存着玩弄的心思。”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集中体现在作家对主人公倪焕之的塑造上。叶绍钧有意把主人公放在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中，成功地揭示了他思想性格的发展。倪焕之生活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代。他的人生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受过西方“新学”的启蒙，“平民思想”的影响，具备了初步的民主思想。辛亥革命流产后，他陷入失望彷徨境地。这是个封建复辟的时代。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些重大事件，小说都做了侧面交代。倪焕之的失望、彷徨和对国内政治的厌倦，正是“时代苦闷”的表现。就在这时，他受到一位热心

教育的同事的感染启发，“教他的心转了个方向”。他开始把“一切希望悬于教育”，并应蒋冰如校长之邀，赴乡镇小学就任。小说就从这里开篇，紧紧围绕主人公两个方面的追求，刻画了他思想性格的最初阶段。一是“理想教育”的追求。他主张学校“只能替儿童布置一种适宜的境界，让他们自己去寻求，去长养”，并按照“知和行合一”的原则进行了一系列新教育法的试验——开工场、办农场、建戏台、筹备博览室等等，力图在学校养成学生将来适应社会的本领。这种教育自然比当时束缚儿童身心健康的僵化的封建教育优越、进步，但它毕竟是改良主义幻想，在封建复辟时代根本不可能实现。小说细致地描绘了农场创办伊始的一场轩然大波：乡镇谣言四起，旧习惯势力拚命抵拒，地方恶霸蒋老虎乘机兴风作浪，终于使新教育法的试验显出不死不活相，使倪焕之感到幻灭的悲哀。二是在个人生活上寻求志同道合的伴侣，建立“理想家庭”。这集中表现在倪焕之与金佩璋的恋爱方面。金佩璋是较早走上“自立道路”的女性，当时正在女子师范上学，对教育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倪焕之自以为找到了一位“理想的女子”，但是结婚以后，金佩璋身上负荷的“传统性格”很快暴露出来，什么“自立”，什么“事业”，统统抛到了一边，心甘情愿地沉没在家务琐事中，致使主人公感到“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理想家庭”的美梦也化成了泡影。倪焕之原先以为只要同时实现了两个“理想”，“整个生活就象一首美丽的诗”，至此反倒暴露出这位勇于追求的青年的致命弱点：耽于幻想，天真脆弱。

正当双重幻灭的悲哀袭击着倪焕之的时候，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冲击到乡镇，重新燃起主人公的救国热忱。倪焕之

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学生游行、演讲活动。他在一次讲演中说：“大家把民族国家的事情担上肩膀，才是生路啊！”会后又对以前“专办教育，不问其他”的信念产生了怀疑。他跟蒋冰如一道检讨反省的结果，认为以后应当面向“社会大众”。他说：“我们不但教学生，并且要教社会！”宛然成为社会大众的“先觉者”。小说对主人公在五四运动中的进步和他表现了狂热情绪，都做了生动描写。倪焕之听从革命者王乐山的劝告，抱着探求教育“根柢”的热望跑到上海。然而到上海以后他却找到了“革命”。“在辛亥年成过功而近来颇有新生气象的那个党，渐渐成为他注意考察的对象。”这时已经是国共合作时期。倪焕之从国民党“一大”宣言受到启发：“这宣言给与他许多的解释，回答他许多的疑问；所谓生路，他断定这一条就是。”“革命”二字在他头脑里渐渐“形成固定的观念”。随之对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也有了新认识。他认为“目前的教育应从革命出发”，准备“从今后做一个革命的教育者”。他参加了“五卅”运动和上海光复前夕的地下革命活动。在斗争中，他开始朦胧地感到工人群众的力量，忏悔自己过去的僭妄，表现出“我得从他们学习”的良好愿望。小说虽然对主人公在大革命高潮时的地下活动缺少正面描写，但是这时倪焕之的进步依然清晰可辨。他不止走过从乡村到城市的路，更进一步接近了革命，参加了群众运动。与教育改良时代相比，他这时思想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应该说，主人公的这段经历在广大追求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很有代表性。小说在描写主人公向革命转化的过程中，还时时注意揭示他思想上隐伏的危机。倪焕之毕竟是一个脆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如果说耽于幻想的弱点在教育改良时代表现为天真幼稚，不谙世

事，那么在革命时代则更多地表现为对革命的不切实际的认识和要求，以及随之产生的“左”倾幼稚病。在五四运动中表现过的狂热，到大革命高潮时又得到了升级。小说描写他对北伐战争抱着盲目乐观情绪，“相信光明境界立刻就会涌现”，以致王乐山启发他认识革命的残酷性、艰巨性的那些话，他都没有放在心上。从这种认识出发，他又不满足于眼前的工作，觉得“现实的境界与想望中的境界不一样”，时时产生幻灭感。他急不可耐地说：“我们应该把历史的轮子转动，让它转得较平常为快。”他甚至欣赏佛经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那句话，大有代革命受难的劲头。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这种狂热性又很容易转化为灰心丧气。列宁说过：“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动摇，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遇困难而张皇失措，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心慌意乱，焦躁不安，东奔西跑，痛哭流涕”^⑩。主人公在大革命失败后陷于更深的幻灭，终日借酒浇愁，郁郁而死的情景，就是这种小资产阶级习性的生动写照。他在弥留之际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这样的告白：“唉，死吧，死吧！脆弱的能力，浮动的感情，不中用，完全不中用！一个个希望抓到手里，一个个失掉了；……像我一样的人，当然也没有一个中用！成功，不是我们配受领的奖品，将来自有与我们全然两样的人，让他们受领去吧！”这段话虽然带有过于感伤的情绪，但却真实地说出了倪焕之式的知识青年的致命弱点，也表达了作者对这一致命弱点的批判态度。

这就是《倪焕之》所描写的主人公短暂的一生。由此可见，时代、社会对倪焕之思想性格的发展起了多么巨大的推动作用。小说对辛亥革命后的封建复辟时代，对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以及“四一二”大屠杀等，都做了

或详或略、或正面或侧面的描写。这些描写一方面展现了时代社会的风貌，另一方面又是始终围绕人物思想性格的刻画展开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在整个小说中构成了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的主要部分。主人公的积极向上、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的进取精神，固然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得到了有力表现，就是对他的缺点弱点的描写，也是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完成的。因此可以说，小说对倪焕之这个形象的塑造，乃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此紧密地将环境的描写与人物的刻画统一起来，显然比作家“五四”初期的小说有了巨大进展。这是叶绍钧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趋于成熟的一种标志。小说对主人公的现实主义描写表明，倪焕之既不是大智大勇的英雄，又不是浑浑噩噩的庸人，他是一个富于革命性而又常常耽于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这就是他的思想性格的基本特征。至于小说里的其他人物，如从热心教育改良变为“时代落伍者”的蒋冰如，横行乡里而又善于政治投机的蒋老虎，作家也都结合时代、社会的描写，比较鲜明地刻画了他们的思想性格。

《倪焕之》的场面描写、心理刻画也都相当出色，表现了作家艺术上的进步。早在五四初期，叶绍钧就擅长描写人物在某个特定场景下的感受（如《伊和他》描摹清风朗月下母子之间爱的交流的画面），大都是为了表达一种单纯的思想或意念，如母爱、童真等，而往往忽视人物性格的刻画。

《倪焕之》则不同了。它的场景描写恰恰是为了展示人物的性格，或者为了造成一种环绕人物活动的环境氛围。小说里精彩的场面触处皆是，如小说开头倪焕之乘船赴任的情景，小小的洗尘宴会，小乡镇的灯节盛况，五四救国演讲会，等等。拿蒋冰如为欢迎倪焕之而举办的那个小小的便宴来说，